

应对风险迎接挑战

——嘉宾共同展望中国金融前景

本报记者 陈果静

论坛聚焦

在6月27日下午的“中国金融前景展望”论坛上，围绕杠杆率、人民币汇率等中国金融发展中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嘉宾们展开了热烈讨论。

焦点一：

对高杠杆问题不必悲观

杠杆率高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的潜在风险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总的杠杆率确实比较高，但更应该关注其中的结构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2008年以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几乎同步，但此后却出现明显分化——国企杠杆率持续攀升、民营企业杠杆率却不断下降。“这种分化的原因是200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在政府对国企和民营企业不对称的信用背书情况下，导致了分化。其中的风险尤其集中在国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

巴林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杨 涛

“‘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中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哈立德·艾勒·鲁迈希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未来中巴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鲁迈希表示，巴林虽然在中东国家中面积小、人口少，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与区域内其他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可为中国企业通过巴林进入中东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鲁迈希说，“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更有利发挥巴林的优势。古代“丝绸之路”就曾为中国和巴林的贸易往来搭建了重要桥梁，新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于重建两国经贸关系，提升中国同巴林以及区域内各国交流与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巴林的金融服务业相对发达，法律健全，劳动力素质较高，企业运营成本较低，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进入巴林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希望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进巴林，巴林也愿意帮助这些中国企业扩大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业务往来。

对于中巴两国经济发展的共性，鲁迈希表示，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多次强调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这对巴林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近年来国际石油

价格不断下降，巴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都在致力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逐步降低宏观经济对石油产业的依赖程度。目前，巴林的石油产业在GDP中占比为20%，是中东国家中较低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过程中，金融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已经成为巴林经济发展新的重要支柱，这些领域也将为中巴两国未来进一步加深经贸合作提供广阔市场和投资机会。

对于希望到巴林投资的中国企业，鲁迈希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地了解中东国家的国情。这一区域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社会相对富裕，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次，中东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在经历经济转型，希望中国企业更多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而不要将目光仅仅停留在石油和能源领域。第三，巴林非常看重电子商务、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



如果患者能从互联网上直接打印药物，将会发生什么？6月27日，在主题为“情景假设：可以从互联网上打印药物吗？”的分论坛上，来自美国、韩国等国的学者与现场嘉宾深入互动交流。

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调整和改革决定经济未来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在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未来能走多远、经济增速能有多高取决于今天的调整和改革，因此应该眼光放长远一点。

当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产能。李稻葵认为，我国并没有把GDP当成唯一的指标，当前中央政府已经将去产能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包括河北在内，已经将去产能纳入了工作目标之中，成为GDP之外，另一个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李稻葵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仍然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格局不会改变。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今天增长速度稍微慢一点，借此机会调整到位，未来能够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越是“深水区”的改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越需要“示范”和典型案例。他认为，“不能看着书本学游泳”，而应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指引。

应对转型挑战 共创美好前景

本报记者 熊 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下，中国制造的未来将走向何方？6月27日，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智造”分论坛给出了答案。

“中国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用两句话来概括制造业的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在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二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对消费的适应性还不强，比如中国老百姓海外‘扫货’。”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表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本出路还是靠创新驱动。从全球历史来看，基本上创新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是逆向分布，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时恰恰是创新比较活跃的时期。

冯飞说，经过几年的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共识。它所带来的，一是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前几次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机、电气化所解放的是人类的体力，这一次所解放的是人类的脑力。二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由大规模生产转向规模化定制。三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可以基于互联网获得全球最优秀的创新资源和制造资源。四是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企业的网络化、扁平化成为新趋势。五是新的产业形态不断出现，比如共享经济和移动经济。

在冯飞看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带有相当大的复杂性。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历史

程，在这个工业化的压缩过程中呈现出了多样性。面对这样的多样性，从现在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出现了加快发展势头，但它在制造业中的比例也只有12%左右，所以主体还是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根据行业特点来推进。例如，在纺织服装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成功案例，比如说个性化的定制。当然，这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些好的经验推广形成主流，那么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对此，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深有感触。“浪潮本身是一个传统的服务型生产厂商，现在变成了云服务供应商。”孙丕恕认为，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过程中，大数据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要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数据。

“我过去在钢铁行业工作，现在全球钢铁工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挑战。”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认为，对中国制造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来说，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型升级，也就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当然，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必须用不同的方式。

中国制造的转型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创新生态的影响。对此，冯飞表示，建立创新产业生态说起来容易，如何做却需要有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精准的政

策扶持，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些领域是具有颠覆性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平衡的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需要平衡的是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的关系，既要使生产者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还要让消费者充分享受到创新的成果。这就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把市场力量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增长动能充分发挥出来。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标准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晓刚认为，没有标准的支撑，质量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德国与日本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中国经济要转型、中国制造业要转型，还需要把工匠精神变成人的自觉意识和商业文化。

孙丕恕认为，“中国制造”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产品卖出去，而是要输出最新的技术和服务，帮助当地解决就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这样中国的国家形象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冯飞表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学习以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同步赛跑的双重任务，与其他国家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全球都面临着转型，而且转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就需要中国与全球共同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应对转型当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共同创造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美好前景。”

访谈

携手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

——访GE全球高级副总裁段小缨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正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的通用电气公司(GE)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愿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携手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记者：GE如何解读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制造业和全球行业生态带来的影响？

段小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一个崭新的工业生态系统，软件开发商、数据运营商、硬件供应商都将加入并共同改变传统制造业，用软件和大数据的力量激活创新、提升效率，同时催生制造服务业等新业态。中国制造业乃至全球工业将由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制造2025”已对此作出了前瞻性引导，强调开展跨行业、跨地域的开放式协作。数字工业的转型将为中国培养出精通硬件和数据科学的人才，为“中国制造”保持竞争力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GE愿为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贡献力量，充分发掘下一个新工业时代的潜能。

记者：面对上述新形势，GE中国作出了哪些调整？

段小缨：GE积极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拓展数字和软件开发能力，优化现有资产和运营，同时实现服务模式的创新。今年7月份，GE中国的数字工业应用开发中心将投入使用，在航空、医疗、能源、制造等领域展开试点项目。公司还将全球最新的数据分析应用方案率先引进中国，逐步拓展应用覆盖范围并推出本地定制方案。

当前，公司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提升核心业务能力，降低能耗，实现业务形态转型，在能源、家电、航空和油气等领域塑造市场新格局，从生态链的角度布局全球。同时，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利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重塑下一代以工业设备为主导的服务业。

记者：GE全球和GE中国近期正在经历转型，请介绍一下转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下一步安排。

段小缨：在全球范围内，GE转型的重点方向是回归工业。去年GE完成了2000亿美元金融资产剥离，加大了工业制造的业务比重，并成立全球数字业务集团，开启了数字工业的转型，成为一家更具创新和科技含量的公司。当前，GE正全面加速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转型，通过软件和大数据为各行业客户提供全新价值。公司建立了“GE商店”，将公司的技术、知识、产品和人才置于一个更为有利于交流协作和协同的框架之下，面向全球客户和工业软件开发者开放，增加规模效益。

在中国市场，GE制定的未来5年转型目标是全面加速本土化，建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全速推进数字化。GE认为工业互联网能发掘中国下一个新工业时代的潜能，大力支持“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软件解决方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应用为中国航空制造、医疗和能源产业创造新的价值。

金融供给高效透明是关键

——访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

本报记者 袁 勇

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就全球经济、国内金融改革等议题专访了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

记者：如何理解此次夏季达沃斯的主题？如何看待在全球技术变革同时，经济存在不确定性？

陆红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点是颠覆性，是一种根本性的技术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性，各个学科、各种技术实现了大融合。

不确定性并非经济走弱，关键在于如何操作。2008年至今，在不确定性中成功操作并受益的主要货币包括美元和人民币。美元从逆周期的量化宽松到进入缓慢升息通道，平衡了次贷危机；而人民币入篮也拓宽和加快了国际化进程。世界经济将长期呈波段状，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将随着科技创新日益增加，先入为主能使其中的收益与日俱增。

记者：怎样看待金融供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

陆红军：高效透明的金融供给是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无论是结构性改革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在不确定性中呼唤健康的金融供给，以金融供给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将成为中国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引擎。

记者：中国的金融供给还有哪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陆红军：中国需要在治理、创新、监管、伦理这四个节点构建全链条金融供给体系。

第一，公司治理是保障信息披露与资产透明度的核心，董事会决策层应始终关注投资与经营决策的全过程，从注重投前决策到关注投后管理全链条治理、从“三重一大”的单一个案决策到总量风险管理、从经营决策跟踪的管理层报告制到治理层评估制，从资产重组、定向增发到互联网金融领域，审慎决策、充分披露。

第二，必须整合公共资源、学术资源和产业资源集约创新。当前在金融供给中急需解决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个困境：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对不同所有制资产实施监管模式的创新。我们能否借用“一国两制”思维，在混合经济实体中尝试“一企多制”新型监管模式的探索？这需要国资委、证监会与企业界的充分合作，探索成功模式经验并转化为金融供给的政策法规来推广，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优势互补的良好生态环境。

第三，公正有效的金融监管已成为结构性改革的一大挑战。由于监管滞后，P2P一度出现了严重乱象。在重大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应当借鉴国内外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果断实现从金融安全和金融服务的双峰监管到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共享监管的多峰监管，使央行主导的穿透式监管制度尽快落地。

第四，长期以来，中国在金融要素市场硬件建设的投入远超金融基础设施软件建设投入，甚至一度出现学界泛商业化和商界泛金融化状态，这是我国经济从排浪式定量中心走入产业链的定位中心过程中，形成过剩、短板与泡沫的社会心理根源。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引领和伦理重塑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焦点。